

收藏家

首都博物馆、阅甫斋、收藏家杂志合作举办
中国古典家具——紫檀学术研讨会及紫檀专辑

2007 增刊

紫檀 起源神秘的异国高贵硬木

□柯惕思(美)

从颜色、硬度与密度等方面论述紫檀的传统定义。以早期小件和大型器物为例，论述明清两代使用紫檀的情况。



图2 紫檀笔筒与香炉，明万历时期的宫廷风格

目前紫檀的学术研究是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主要归结于两个层面：一是收藏家与家具制造商对该领域的高度爱好，二是拜新世纪所赐的种种便利条件，使得讯息可以透过网络传输迅速取得，旅行的开通落实具体的实地研调，以及方便可用的现代化科学分析法。这体现在周默先生在植物学上的研究尤其明显，他经过多年的调查与研究从而确定小叶紫檀源头地在印度的迈索尔的成果。如今，紫檀在植物学上的分类，有了一个更清楚的途径。

过去几年由朱家潘、田家青与胡德生所编著的宫廷造办处与档案记录的出版物也明白的显示了紫檀深受清宫廷的喜爱。这些资料同时提供了丰富的附带资料，从而增进我们对紫檀作为木料以及在紫檀家具制造传统上的历史了解。

我想进一步探讨的两个相关的层面，包括：①紫檀的传统定义，以及②明清两代使用紫檀的情况。

一. 什么是紫檀

尽管印度迈索尔的小叶紫檀在近代紫檀的研究中被认定为一个重大的精细分类，但这并不能消除千年来紫檀未曾有过任何严谨的植物学分类与定义的事实。那么，什么是紫檀呢？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个问题有一点像在问“什么是玉”一样。历史上，紫檀一



图3 紫檀文房，上海宝山的万历之墓出土

词也是定义甚广。古时候是以什么方式世代相传分辨紫檀呢？

颜色

首先，紫檀顾名思义，就是紫色的蔷薇木。于是，它的深紫红色的染色体是一个辨认的特性。而事实上，许多的古代文献提到紫檀是染色料的一种来源。在格古要论中，王佐透露了测试“真紫檀”的方法——用一块小料在白色的表面上磨擦，看是否落下紫色的痕迹。当然，现在我们都知悉也有一些紫色的硬木会落下色迹。

18世纪的菲律宾林业管理纪录也记载了一种名为“廷达娄”（音译自原文 tindalo）状似紫檀的深色硬木，为中国人所用制成精美昂贵的家具，此外还提及中国人知道如何以盐水浸洗木材以析取血红的染色料。笔者猜测，现今一般所称的“花梨紫檀木”可能与该菲律宾木料颇有渊源。

硬度与密度

硬度与密度也是传统的辨识法则。菲律宾的官方资料也记载除了颜色深之外，木材不漂浮对中国木材商人而言最为重要。他们不在意当地木材名称为何，他们只用自己的土法，以斧头劈开木材作肉眼的检验。

来源

一些古代典籍的作者也记载紫檀的来源，除了印

度，还遍及东南亚许多地方。这些不同地域的紫檀，必然有不同的变体品种，不过他们倒是共同具备相似的辨识特性：含量极丰富的紫红色色素，木质非常坚硬以及置于水中会下沉的密度。

公元3世纪的《古今注》举出一些古地名的产地来源，亦即当今的越南与寮国一带。

唐代的《本草》指出紫檀来源由马来半岛的古国盘盘进口。

早明的《格古要论》提及海南、广西和湖南为中国境内的来源。

早清时期，屈大均指出海南岛产地来源。

清代，菲律宾的资料已记录了色素含量极丰富、状似紫檀的木材。

明清两朝对紫檀的辨识

那么过去人们对于真假紫檀的关切又是如何呢？到了晚清时期，对于能否鉴别酸枝与紫檀已有不少关注，前者带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且少了后者有的“蟹爪”纹理。

带款的一把晚清时期的摇椅也反映了一些何谓紫檀的关切。搭脑背面的刻款写的是：“自办正式紫檀木……”（图6）。尽管木料一眼看出并非小叶紫檀，起造人却信心十足鉴定为上等紫檀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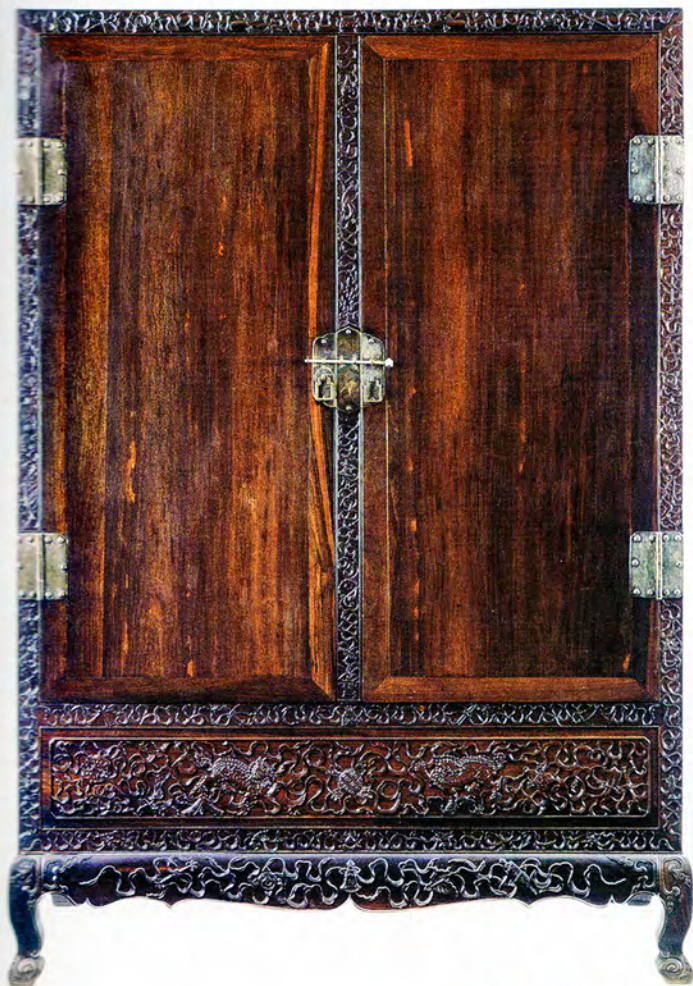


图4 明晚期风格的形制和装饰的紫檀家具

姑且不论当前真假紫檀的判准观念，史实提示了紫檀是根据采办人员宽松的经验法则而广义辨识的。而这种经验法则，经受不住严谨的植物学定义的考验。中国人的传统紫檀概念更加宽泛。而这样的双重性标准势将难以推动紫檀迈向简单的分类法，我相信对各个类别的紫檀进行严谨的植物学定义，将最终让人们对于紫檀家族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二. 明清两朝如何使用紫檀

早期小件

检视历史文献以及现存实物，紫檀直到清代以前

几乎用在制造小件上。由此也推断当时有的木材一般而言都是小料，一直到了17世纪，也许是当时有了大料来源才有所改观。

唐代有关紫檀的参考文献指出紫檀主要用于制作棋盘、围棋子、轴头套、小盒及乐器等小件奢侈品。在日本正仓院的收藏品中，还保存着该时期的几件紫檀小器（图1）。

早明时期，公元1462年增订版的格古要论注释：“……作冠子（译者：发夹）最妙。”——推论当时的紫檀木料管径颇小。

从明朝初期到16世纪晚期，紫檀器物及（或）相



图6 明晚期风格的形制和装饰的紫檀家具

关文献的数量都少得微不足道，可见紫檀仍然是稀有罕见的舶来品。在严嵩恶名昭彰的抄家财产目录里，有各色各样的小件器物，却独不见紫檀制者。

明隆庆年间（1567—1573年）海禁解除，外国货物再度得以叩关进口。世界各地的商人立即群起响应，一船又一船的珍奇热带硬木货物运往中国的沿海城市求售。其后数十年间，邻近区域的作家也开始记录以进口硬木制作的高级器物所拥有独特出众的外观纹理。即便如此，当时的文献仍极少提及紫檀制的大件家具。

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太监刘若愚也曾记载宫廷作坊制作的小件紫檀器物，包括紫檀双陆棋盘、

棋子、骨牌和木梳等。图2中的笔筒与香炉盖两者都反映明万历时期的宫廷风格。

在高濂、屠隆、文震亨等人的著作中，最常提及的仍是小件器物，例如官皮箱、书匣、墨匣、笔筒、笔筒底座、盛盘及香炉盖等。位于今地名上海宝山的万历之墓出土了这样一组的紫檀器物（图3）。他们反映了晚明江南的文人风格。

大型器物

即便再晚至17世纪后期，还是紫檀小件。根据屈大均（1630—1697年）记载，当时销售分布中最广的为广东匠师以海南岛紫檀所制的小件器物。一直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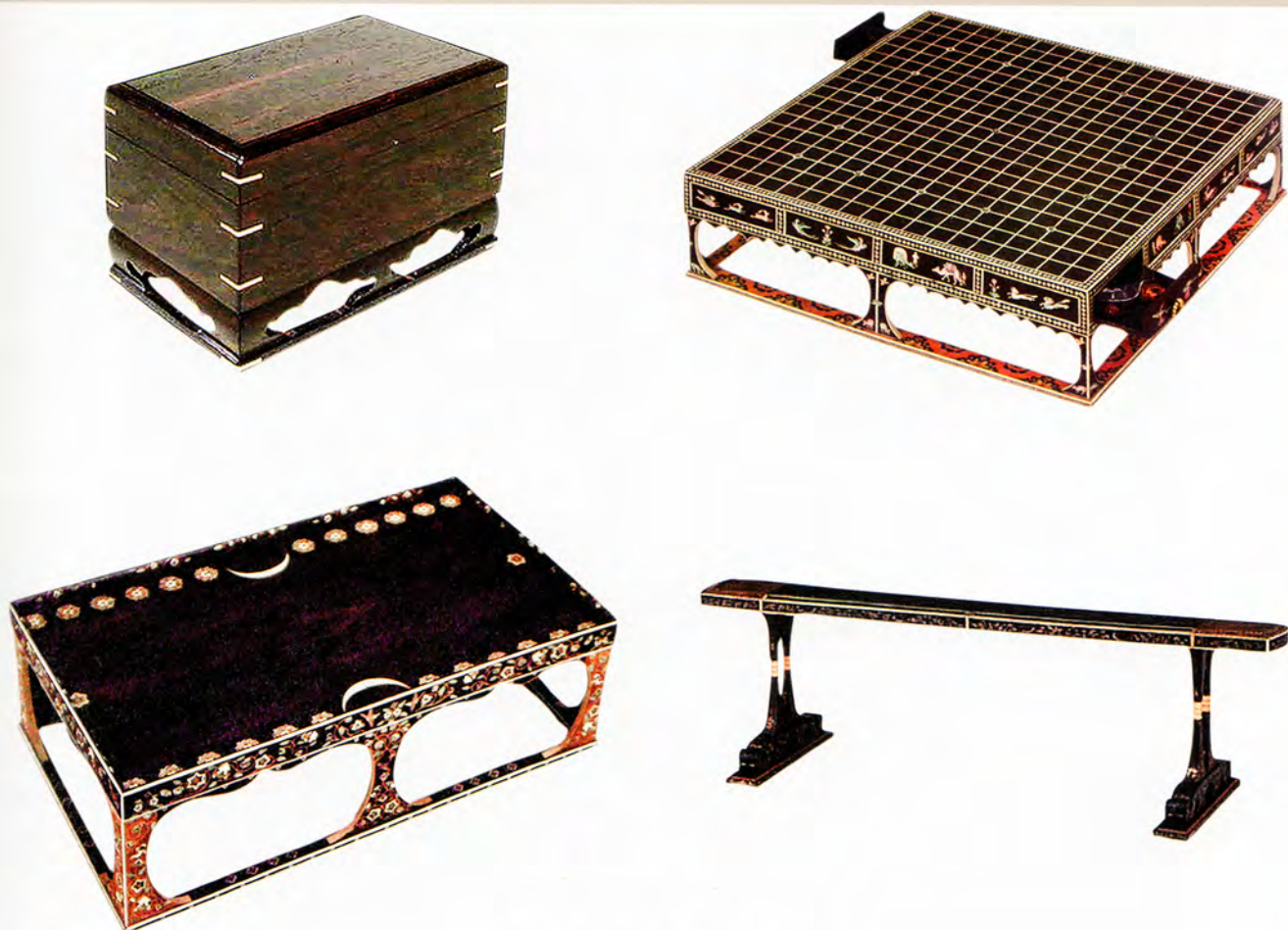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正仓院的紫檀收藏品

到再发现一件尊贵罕见的大型紫檀家具时，已时逢王士禛晚年岁月（1634—1711年），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北京有人欲以一百二十金的重金出价求购一件紫檀嵌百宝的坐椅。

在明朝最后数十年或满洲人入主中原后的一段期间内，确切时间不详，皇宫显然累积贮藏了可能得自于贡品的大量紫檀木料。而且从这批木料足以制作大件家具的事实来看，其来源必定出自新发现的大乔木产地。

这番推敲与为数不小都具有显著“晚明”风格的形制和装饰的紫檀家具实例（图4），在时间上和尺寸上有着相呼应的巧合性。这些家具展现共同的特点：不惜耗用上等紫檀木料，并裁选纹理一致的木材打造，毫无一丝俭约心态或节制资源有限的珍贵木料。

康熙时期的《大清会典》记载了来自广东的岁贡

——14件紫榆，每件重达150斤，长七尺。这则记录与屈大钧记载海南木材属同时期，后者还提到紫榆是紫檀的别名。有趣的是，时隔百年之后的文献记载却指出海南紫榆的别名是酸枝，还说该木材少了辨识性的“蟹爪”纹。多数有专精的人都会同意几乎没有红木或酸枝的年份会早于乾隆时期。因此，很有可能是紫檀到了道光时期，由于砍伐过度，所采伐到的木材品质下降了，加上/或者被其他品种取代了。随着海南黄花梨在整个18世纪期间被大量采伐，大部分大管径的紫榆/紫檀树也很可能清晚期前就被采收了。

根据宫廷档案中的几件纪实记载，我们看到了早清王室有时会以珍稀高贵的紫檀来仿制宫内广受喜爱的家具的一项惯例。雍正七年（1728年）曾根据当时一张朱漆桌的规格以及另一张黑漆桌的造型订制了一



图5 养心殿紫檀炕罩和群板



张紫檀条桌,也曾以紫檀仿制一张旧有的朱漆灯挂椅。(中国悠久的复制及仿真的传统,也是深植中国人本质的习性,正是家具不易断代的困难之一。)

在清中期期间紫檀持续备受高度珍视。许多的宫廷家具都是来自地方官吏的进贡或赠礼。单是公元1771这一年,宫廷就收到近百件的紫檀器用,包括宝座、屏风、桌案、橱柜以及其它杂器。而类似的紫檀家具贡品也来自广州、福州、浙江、江苏等地的显要官员,如此辽阔的地理分布点出了清帝国富庶之穴脉所在的沿海地区。

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为了翻修圆明园^[1],扬州盐政司曾分别在1814年与1817年两度提供总计两百多件,大小不等的紫檀镶嵌器物。大型器物包括百宝柜,与地同宽的地罩以及约莫两百多片窗花板,每

片超过九尺高。这个工程的规模相当大,需动员上千名工匠。虽然这一切可能都已毁于抢掠与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中,但在养心殿内存留的炕罩和群板(图5)还是颇能代表当时扬州工坊的工艺水平。

尽管18世纪末期(道光末年)宫廷的紫檀存量已趋枯竭匮乏,而19世纪初期宫廷以外的其他地方有不少紫檀料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由香港老子号家具商手上所存留的紫檀器物(图6)来看,事实更是胜于雄辩。大家都知道广东的有钱人家有订制成套紫檀家具的传统习俗,此风气持续不断直到民国时期。

到底那一种是紫檀呢?那是我会留待植物学家研究分析的答案了。

[1]钱泳。《履园丛话》(序成于1825年)。笔记小说大观2:5,卷12,7页右。